



浙江历史文化专题史系列

浙江工艺美术史

Zhejiang Gongyimeishushi

郑巨欣 主编

杭州出版社

浙江工艺美术

郑巨欣 主编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工艺美术史 / 郑巨欣主编.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80758-579-4

I. ①浙… II. ①郑… III. ①工艺美术史 - 浙江省

IV. ①J5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5874 号

浙江工艺美术史

郑巨欣 主编

责任编辑 孙旭明

封面设计 祁睿一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 (杭州市西湖文化广场 32 号)
电话: (0571) 87997719 邮编: 310014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3

字 数 417 千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579-4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 任	夏宝龙			
副主任	王辉忠	葛慧君	龚 正	赵一德
	刘 奇	郑继伟	孙景森	金德水
成 员	舒国增	胡庆国	李云林	吴顺江
	胡 坚	徐明华	焦旭祥	刘希平
	钱巨炎	金兴盛	寿剑刚	张伟斌
	郑新浦	童 健	许 江	梅新林
	陈德喜	蒋承勇	陈一新	马 以
	鲁 俊	钱建民	徐加爱	陈 新
	吴蔚荣	王永康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

华夏英才基金资助出版

《浙江工艺美术史》撰稿人名单

撰稿：郑巨欣

陈永怡

陈 晶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舒志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

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的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

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

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绪 论

浙江工艺美术史是中国工艺美术的地方史。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这里山地、丘陵绵延，海域广阔，岛屿星罗棋布，省府杭州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浙江历史悠久，这里的人民受益于山水物产，陶染成俗，又生活、创造、作用于斯，从而成就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浙江的工艺美术史是睿智、勤奋、务实的浙江人民与浙江独特自然环境的共同创造，是工艺美术在浙江从古至今的重要记录，是浙江人民日常生活方式的物质见证。

（一）历史沿革

历史悠久的浙江工艺美术，经纬万端，变化发展。为了清晰呈现这一丰富的历史文脉，传统方法是将历史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加以论述。

一般来说，历史分期可以有以下三种：一是根据王朝兴替，将历史分为不同发展时期。如史前、夏商周、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以及近现代。二是综合技术、品种、艺术、思想的演变特征进行划分。如将历史分为蒙昧、初创、滥觞、中兴、鼎盛、衰落、复兴等若干发展阶段。三是依据社会制度不同的历史分期。如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奴隶社会的工艺美术、封建社会的工艺美术、社会主义社会的工艺美术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史书往往都是写给帝王看的，所以中国传统史观是“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受此影响，以往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撰写也多见以王朝兴替分期，而且内容也是以青铜、玉器、名窑、织绣、金银器等贵重器物为主，较少描写

民间日常用器。现在看来,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按照社会制度不同编写的体例,现在已经不再采用了。新的工艺美术史观越来越重视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以生产力、思想进步和制度的改变为主线,侧重于工艺美术本身特点及其发展规律。但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性,所以王朝兴替与工艺美术本身的密切关系性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综合起来看,浙江工艺美术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曙光初现的史前时期。浙江史前工艺美术不仅反映出了史前浙江地理物产的独特性,承载着浙江先民的生活方式,甚至还见证了中国早期文明在长江流域形成的过程。史前工艺美术可以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其发展情况主要依据考古发现。迄今为止,浙江境内旧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 90 余处,并且初步建立起自早更新世晚期到晚更新世晚期浙江旧石器时代的年代序列。浙江新石器时代遗址几乎遍布全省各地,从墓葬出土的不少工艺美术品,无论是从技术还是从审美的角度看,都堪称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的代表。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不仅发现早,并且以出土工艺美术品的造型精美、内涵丰富和技艺高超著称。崧泽文化前继马家浜文化,下续良渚文化,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综合特性,为揭示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工艺美术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证明。此外,随着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发现和确立,浙江新石器时代工艺美术史的年代上限,已经上溯至距今 1 万年以前。

2. 滥觞变幻的周秦时期。相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发展进程而言,当时被称作越地的浙江工艺美术颇为独特,即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的浙江工艺美术,并没有按照物质技术发展的一般逻辑进入青铜时代,并且原有的城市遗址、祭坛,陶文以及雕刻精美的玉器神人纹等,在这个时代渐渐消退。周秦时代的浙江人也许已经不太记得自己祖先的创造了,所以当时反倒是流行起了相对原始的几何印纹陶。不过流行什么也就得到什么,几何印纹陶为后来瓷器的烧制成功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浙江也从北方发达的青铜工艺中汲取营养,一方面模仿生产北方样式的青铜礼、乐器,另一方面也生产

类似绍兴狮子山 306 号墓出土春秋时代的,如伎乐铜房屋模型等地方特色产品。周秦时代浙江金属工艺发展的重点是实用青铜农具,尤其因吴越战争需要发展起来的兵器,如精良越王剑名扬大江南北。当时的越王剑,不仅有早期的青铜剑,还有晚期的铁剑。公元前 355 年,楚灭越,此后楚文化渗透到了越国故境。公元前 221 年,秦代统一全国,秦代郡县建制对后世浙江工艺美术的区域特色的形成影响巨大。

3. 转型发展的汉唐时期。汉唐时期浙江工艺美术总体发展平缓,早期品种相对单一,其中青瓷和丝织为代表有较大发展,应用广泛。如承续东汉烧成的青瓷在六朝时更趋完美,唐代浙江的越窑已名冠全国诸窑之上。相对于青瓷等取得的成就,汉及唐代前期的丝织品延续生产绫绢纱罗等,却为当时的南下北方人所不屑。这件事在李肇《唐国史补》中说的很清楚:代宗宝应元年(762),薛兼训任越州刺史,认为“越人不工机杼”,遂采取“越人娶织妇”的办法来发展丝织业。而与北方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有金属、髹饰工艺等。如商周金属工艺至汉代转以生产日用器为主,当时会稽的铸镜技艺非常出名。金属器中的金银工艺虽然盛行于中国西北,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出土于临安县的一批唐代金银器看,其工艺水平也毫不逊色于西北。在髹饰工艺方面,唐代似曾流行一种叫“金漆木”或“黄漆树”的天然树脂涂料,此漆料出产自台州黄岩县东镇山,朝廷曾将此作为土贡。另据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载,鉴真六次东渡,曾携“金漆泥像一躯”以及雕工漆匠等,由于过程中经历当时漆器生产发达的宁波、温州、黄岩等地,所以也不排除浙江在这方面的贡献。

4. 景象繁盛的宋元时期。宋元浙江工艺美术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与晚唐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南移有关;二是与五代钱缪恃强自为吴越国的励精图治相关。五代浙江享有“钱塘富庶,甲于东南”的美誉,当时的越窑被称作“秘色窑”,是名副其实的官窑产品。北宋时杭州成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宫”,诸多工艺美术均取得可喜成就。如当时温州的戗金和描金工艺颇引人注目,瑞安仙岩寺慧光塔出土北宋识文描金堆

漆檀木舍利函,极为精美,是宋代漆器的标志性器物。南宋定都杭州后,浙江不仅政治地位提高了,经济也因此空前繁荣,凡丝绸、印刷、瓷器、造船、制扇以及军器制造的发展均十分显著。南宋浙江瓷器品种趋于多样化,不仅有著名的官窑生产,其他如龙泉窑等也非常出名,瓷器品种趋于多样化。在纺织生产方面,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宋代丝织品有绫、罗、锦、尅丝、杜绉、鹿胎、绞丝、纱、绢、绵、紬等,其花色品种已经超过了唐代,而浙江兰溪南宋高氏墓出土的一条拉绒棉毯,则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在东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两宋时期的手工业生产虽仍分官营和私营,但民间行会制度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发达,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京都有四百十四行”。当时的手工艺人多系雇募身份,称“军”“匠”“军匠”“兵匠”。手工业场所名目有“作”“作坊”“作院”“库”“务”“场”“所”“局”“团”“市”等名称,不一而足。元代统治主要集中在北方,但文化兼容并蓄,超过了以往历代,如对于丝织、瓷器等生产技术的吸收,不少取自江浙、福建一带。元代浙江嘉兴漆器、龙泉瓷器在全国颇具影响,漆器方面据《格古要论》载,杨汇有张成、杨茂者,剔红最得名,而龙泉瓷器生产规模虽大,但烧制质量渐下,器形大而质地粗,已不及宋瓷优美。

5. 尚古工致的明清时期。明代中期至清代前期,复古之风盛行,浙江工艺美术受其影响,相对而言创新不多,但是工艺美术生产仍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浙江明代丝织业在全国许多地方受到棉花种植和棉纺业发展影响而日趋衰败时,依旧蒸蒸日上。所以,明代官府在杭州设染织局,清代浙江也是江南三大织造局所在地之一。与此同时,明清浙江的丝织业还自成系统,出现了如濮院、王店、南浔、双林等都是以蚕丝业出名的城镇。城镇经济发展也带动了瓷器、漆器、印刷、造船等有较大发展。明代浙江的瓷器生产以处州龙泉窑烧制最为兴盛,漆器工艺取得的成就还是嘉兴最为显著。明代嘉兴雕漆延续元代传统,北京果园厂官营漆作吸收嘉兴张德刚等艺人生产的雕漆,有嘉兴派之称。《髹饰录》经嘉兴西塘扬明注释后刊行,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古代漆艺知识。另外,明代嘉兴的戗金戗银

工艺也有很高的成就。而漆与雕二者可谓相得益彰,这一方面以宁波的描金漆器、擦漆细工、朱金木雕、骨木镶嵌表现突出,而东阳木雕也非常有名。明清浙江的雕版印刷仍以杭州具代表性,无论官私出版业都相当兴盛。而明末湖州闵、凌两家将两色印刷发展为多色套印,是当时了不起的一项贡献,遗憾的是湖州套印至清代已无所闻。造船业因杭州为大运河南端,所以发展造船业的条件得天独厚。至清代中晚期,工艺美术普遍发展,新品种不断涌现,其中传为佳话的浙江工艺美术品有杭州张小泉剪刀、青田石雕、乐清黄杨木雕、温州欧塑、黄岩翻簧、泰顺木偶、湖州羽毛扇、善琰湖笔、桐乡夹纱灯、绍兴毡帽等。清代浙江工艺美术行业管理渐趋严格,店东与帮工间的合同及相应承担的义务有了较为统一的规定,这些行规有助于提高生产质量,具有一定的示范引领作用。

6. 鼎新革故的近现代。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两次鸦片战争,致使古老的中国从此面临“亘古未有之变局”,浙江工艺美术受其影响,跌宕起伏,可谓十年一变。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浙江工艺美术的重点转向了发展与民生相关的日用品生产,如各地通过兴办工艺局、传习所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外来工业产品冲击带来的人员就业、技艺传承问题。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突出了以提高工艺技艺增强传统产品市场竞争力这个重点,所以屡见不鲜的各种手工艺赛事、展会多了起来,其中较为著名的如参展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一些赛事和展会上,部分优秀的工艺美术品和制造者脱颖而出。20世纪第三个10年侧重于手工艺产业化生产,如以“厂”“局”“社”“行”等为组织形式的企业渐渐多了起来,这些企业的产品以外销为主。但是,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浙江以出口为主的大部分的企业经济都受到了重创。20世纪的第四个10年由于战争原因,浙江工艺美术企业多数停产,或处于非正常生产的战时状态,致使后来出现生产、消费和设计之间的严重脱节。新中国建立以后,百废待兴,随着国家在艺术教育和发展工艺美术方面主抓的几件大事,浙江也步列其中。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实用美术系整体

北迁,在北京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4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连续举办了两期各4个月的“民间美术工艺研究班”,学员来自华东地区各县市。总体上说,20世纪50年代,浙江响应国家号召,无论是从文化抢救挖掘角度,继承、保护、恢复和发展手工业、传统手工艺、民间美术,还是从生产体制改造和销售渠道疏通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20世纪第六个10年,杭州、宁波、温州等地还相继成立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工艺美术学校等机构,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工艺美术行业的发展形势便急转直下,出现了部分停业、转产、休学等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冲击。几经波折以后,浙江工艺美术行业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的黄金时期。各地、市、县工艺美术公司相继出现,同时一些全国、省市各级的工艺美术品展览渐趋于常态化。1979年10月《浙江工艺美术》创刊,1981年12月浙江省工艺美术学会成立,标志着浙江工艺美术不仅拥有产业基础,而且成为了一个有学术交流主旨的行业管理组织。此后从1981年到1989年,由国家经委、轻工业部主办的工艺美术百花奖,更是频频传来浙江工艺美术获奖的喜讯。20世纪的最后十年,国内产业结构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在乡镇企业迅速扩大、个体私营制度逐步健全的情况下,浙江工艺美术再次迎来了行业发展的春天。

(二) 品种辨章

浙江工艺美术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历代又有不同的生产重点以及社会审美需求,不一而足。这些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形式以及不同的功用和审美等,往往是通过工艺美术品种得以反映。过去,我们习惯于将那些主要为贵族阶层服务的,美术化特征明显的工艺区别于一般工艺,称之为工艺美术或美术工艺,而将主要服务于平民,以实用为主又体现工艺智慧的民间工艺称作民艺,现在这些以手工艺为主要生产手段的产品形式,又都统一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更大的概念当中,因此这三者之者既有部分相通,

也有明显不同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地看,不同概念和认识的变化,其实是源于不同阶段的人们认识上的变化,是由于社会结构、审美观念和生产手段的变化所带来的,而从本质上说,历来丰富多样的手工艺劳动的产品都离不开材料、技术、功用,而且总以艺术的形式加以表现,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材料是浙江工艺美术的重要内容,也是历史的物质载体。古往今来,浙江人民就地取材,开发了许许多多的工艺美术品种,其中不乏像土、泥、石、陶、瓷、玉、水晶、玛瑙、翡翠、玻璃、牙、骨、角、贝、珍珠、棉、毛、丝、麻、羽、木、漆、树脂、竹、藤、棕、苇、草、纸、米、面以及金、银、铜、铁、锡、铝、铅等在内的各种材料。由于材料资源的分布具有不平衡性,所以受此限制又产生了不同品种工艺美术的不同生产区域分布。就当下主要产区分布现状而言,如玉雕主要分布在杭州建德、宁波;石雕有青田石雕、昌化石雕以及广泛分布在杭、台、温、丽、金、甬等地的建筑石刻,分布在温州的彩石镶嵌,分布在武义、遂昌等地的萤石雕,金华的黄蜡石雕,泰顺的龟湖石雕,江山西砚等;象牙雕刻主要分布在温州、乐清等地;陶瓷工艺品有长兴紫砂陶,遂昌、松阳黑陶,江山彩陶,杭州南宋官窑,龙泉青瓷,上虞、慈溪的越窑瓷,金华、义乌的婺州窑瓷,衢州的莹白瓷等;琉璃水晶工艺品有宁波、湖州的琉璃,台州、温州的玻璃,浦江、杭州的人造水晶工艺品等;蜡工艺品有杭州、东阳、黄岩的工艺蜡烛,台州、三门的蜡像等;木工艺品有东阳木雕、乐清黄杨木雕、宁波佛像木雕和白木雕、东阳红木雕等,另有树根雕分布在杭、绍、甬、金等地,以及云和、龙泉的车木玩具,天台、仙居的木珠工艺品和木制礼品,萧山、永嘉等地的木纹拼嵌画,杭州檀香扇,乐清、兰溪的树脂工艺品等;竹工艺品有嵊州竹编、东阳竹编,台州黄岩翻簧,安吉竹家具,杭州天竺筷,永嘉竹盆景,象山、东阳、浦江等地的竹根雕,乐清的竹壳雕,以及温州鹿城区、永嘉等地的竹丝镶嵌和竹丝画帘,绍兴、义乌的竹工艺扇等;草麦秆工艺品有慈溪的金丝草帽;鄞县、温岭、东阳等地的草席和永嘉、温岭等地的草帽,以及广泛分布于温岭、

温州、乐清、瑞安等地的草编，浦江、象山的麦秆画等；泥塑有嵊州、临海、温州乐清泥塑以及温州的油泥塑即瓯塑；米、面塑分别在温州、瑞安、永嘉和浦江、杭州等地生产。金属工艺品有杭州、绍兴等地的黄金首饰，永康、温州的锡艺，温州、台州、仙居等地的银餐具，龙泉的不锈钢宝剑，以及广泛分布于杭州、绍兴、江山的铜佛像，嘉兴、温州、绍兴等地的铁制品；漆器工艺品有温州瓯海、苍南、宁波等地的脱胎佛像，慈溪、余姚、奉化等地的朱金漆木雕，宁波的泥金彩漆，武义、瑞安等地的推光漆画，天台、三门、仙居等地的金漆木雕；丝绸等纺织纤维工艺品有杭州都锦生织锦、西湖绸伞、绢扇，分布于杭州、湖州的绫绢，温州的瓯绣、萧山花边、浙南夹缬、桐乡蓝印花布和彩拷、宁波的金银彩绣、台州的雕平绣和工艺织带、杭州刺绣、浦江的十字挑花和绗缝工艺，以及杭州、富阳等地的手工地毯，平湖、桐乡的羊毛地毯，奉化、富阳等地的布艺镶嵌画，杭、甬、绍、湖等地的棉麻编织品等；贝珠工艺品有诸暨、温岭的淡水珍珠工艺品，舟山、洞头、金华等地的贝雕；纸、皮工艺品有富阳、龙游宣纸和手工竹纸，乐清的细纹刻纸，杭州、绍兴的黑纸扇和白纸扇，永嘉、长兴的风筝，海宁的皮影，硖石灯彩和仙居无骨花灯，以及浦江、缙云、永康、桐庐等广大地区的民间剪纸。此外，像湖州羽毛扇、杭州西泠印泥、绍兴花雕、温州发绣、桐庐烟花爆竹等的制作也非常有名。工艺美术品就地取材，择料而生是其物质形态产生的基本特征，但很多工艺品的最终制作完成，并非仅限于单一的材料，而且需要辅助以相应的工艺，如宁波的骨木镶嵌就是综合采用象牙、黄杨木、骨片、螺钿为原料，经起槽、嵌花、打磨、雕刻等工艺完成的特色工艺美术品。

技术是形成工艺美术品种的加工手段，是历史的非物质表现形式。一般来说，技术由生产者个人所掌握，但是工艺美术技术由于是代代相承，互鉴发展的结果，因此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而非个人的私有财产，其涉及的技术形式有印、拓、绘、髹、雕、刻、凿、钻、镂、刺、削、铲、塑、铸、焊、锤、烧、敲、打、镶、嵌、掐、蚀、扎、结、绣、织、染、编、缝、挑、剪、烫、锯、刨、